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海岛上，半个多世纪来始终有一支中国医疗队坚守当地，留下了一段三代中国医生的援非情缘——

桑给巴尔丁香红

刘 欣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奔巴岛位于印度洋西部，岛上盛产丁香，又称“香岛”。2020年9月，中国（江苏）第三十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来到奔巴岛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开启了援非之旅。

带着“盐矿”的医生

虽说有心理准备，但岛上的艰苦环境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这里常年湿热，病房基本没有空调，一次大查房下来工作服就已全部湿透；中午刚吃饭，一个电话就要去大抢救，又要经历一次汗水洗礼。我们自嘲是带着“盐矿”的医生。

在奔巴岛，队员们24小时当值。白天开诊、手术，深夜抢救病人或观察危重病人病情、组织施救。虽然疲劳，但看着成功救治的患者，心中很是欣慰。这里的孩子眼睛大大的，家长喜欢给他们画上浓浓的眉毛，每当他们病情康复，出院时对我们说一声“阿桑贴萨那”（斯瓦希里语“非常感谢”）时，泪水都会冲出眼眶。时间不会冲淡这样的记忆，只会沉淀到心灵最深处。

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医护人员短缺，儿科只有3名医生。为尽快培养一支当地的儿科医疗队伍，我们从细节着手，整理一套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规范。我指导医护人员计算药品分次剂量，开展有创呼吸机的操作使用、新生儿窒息复苏流程、液体疗法等一系列教学讲座，让当地医生在培训中成长，业务能力尽快过关。

忙碌是常态。片刻闲暇中，思乡是最好的休息。万里之遥的江南古城是我们最深的思念，亲友的信息时刻牵挂着我们的心。作为共产党员的爸妈每月都写首小诗，例如：“建党百年庆事多，援非医疗十月过，人在海外心向党，共庆建党一百年。”想起母亲，我便想起她的“援非梦”，还有母亲的老师周振德医生，那位50余年前在这里挥洒青春和梦想的医生，他的脚印还在吗？

母亲的“梦未圆”

母亲是一名眼科医生，也曾被选拔为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预备队员，但未能成行。她常说，这是今生的遗憾。她的感慨不光因为自己，还因为没能接替老师圆梦。

母亲的老师周振德医生，我称他为“公公”，这是江苏人对家族长辈的尊称。他是江苏第二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员，援外工作时间是1968年1月至1971年2月。援非前，他是盐城医专附属医院（今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教授。

公公于20年前病逝。他生前数次对学生们说起非洲，说起那里的海天一色、雨林苍苍，说起那里的异域风情、纯朴民风，说起他对治病救人、培养出许多当地学生的欣慰……母亲说，公公只要说起非洲，眼里就有很亮的光。从那时起，母亲便下定决心要去援非，这样的梦想点亮了母亲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我出发前，母亲和舅舅特地翻拍了一些老照片，希望我能去公公工作过的纳兹莫加医院看一看。

哈吉院长的“老照片”

阿卜杜拉·姆才医院院长哈吉曾对我讲起他的经历：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纳兹莫加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接受了5年培训，还被选为留学生，到江苏新医学院留学，获得了大学文凭。回国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哈吉抬头望着东方，动情地说：“中国在那边，那里有我的好朋友。”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取下办公室最显眼位置上的一张大合影，那是他在南京留学时和中国老师们的合照，我看到了年轻的公公的身影。他惊奇地说：“这就是你的公公吗？我在纳兹莫加医院培训时，他也在那里。我到中国后，他给我们上过课，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立即把照片传回国内。当天晚上，舅舅在家中也找到一张同样的相片，还有一本名为《辉煌的足迹——江苏省援外医疗队派遣40周年纪念文集》的书，他把其中的一个章节《美丽的眼睛》拍照发给我。那些几十年前的文字，记录下公公与一位名叫奥玛的眼科医生做白内障手术的经过，而这位医生后来成了阿卜杜拉·姆才医院的首任院长。次日，我把这一信息告诉哈吉，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握着我的手反复说：“太巧了！太好了！”

奥玛医生忘不了的“周党员”

哈吉院长请护理部主任阿里联系和他同住一个村的奥玛医生。几天后，我们一行三人在阿里的带领下，驱车到达坎甘尼村。7月的奔巴岛正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家家户户庭前屋旁都晒满丁香花。刚进院，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叫着“亲呐”（斯瓦希里语“中国”）迎接我们。大门前的屋檐下早已铺好崭新的地垫，奥玛医生起身欢迎我们，他很清瘦，面容慈祥，声音温和。

虽然已是89岁高龄，奥玛医生依然耳聪目明，英语也说得很流利。我们围坐在他的身旁，我拿出了公公的照片，他沉思片刻，然后有些激动，连连点头说：“啊，是的，周党员！周教授！他是援非医疗队的党员模范，也是我在中国的老师。”得知公公已经去世，老人一下湿了眼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慢慢讲起那段往事：从1965年起，奥玛在桑岛纳兹莫加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的眼科专家学习，先后有两位中国眼科教授指导过他，其中一位就是周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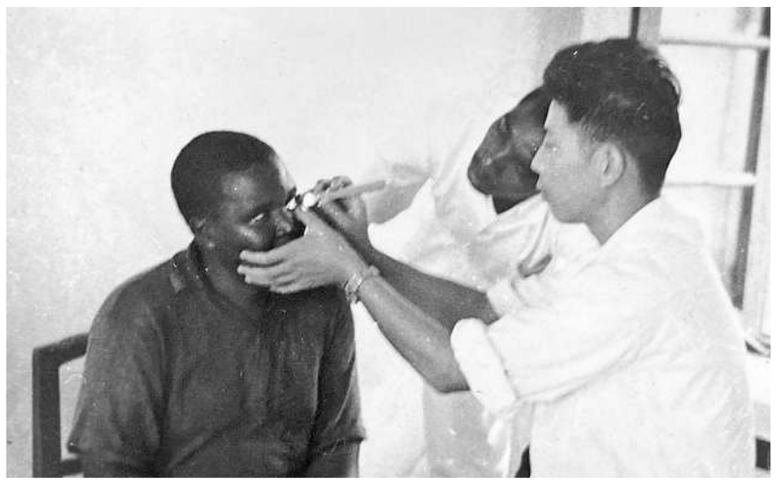
“周教授虽然比我小一岁，但他医术高超，我把他当做哥哥一样尊敬。”奥玛医生眼里闪着光。他说，当时中国援非医疗队门前有一面国旗，队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都非常好。周教授曾给他讲授理论知识，指导他做过许多手术，虽然往事如烟，许多事已难记起，但当他听到纪念文集中提及的患者埃尔玛时，眼中再次泛起泪光：“这是一名糖尿病合并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的病人，也是周教授指导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手术，让病人重见光明。从那以后，我便开始独立完成眼科手术了。”

“你的公公也在奔巴岛工作过。”奥玛医生说，1970年，奔巴岛的阿卜杜拉·姆才医院成立，奥玛是第一任院长，中国援桑医疗队派遣一个小组从温古贾岛转来奔巴岛工作，“周教授就在小组里”。这让我的心再次悸动！我问奥玛医生，当年周教授有没有提起过家人？他摇摇头，说当时援非医疗队里的党员是最忙的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经常帮其他队员替班。老人记得周教授来桑给巴尔时是30多岁，一待就是3年，“我想他一定是想家的，只是太忙了，就把思念都藏在心里。在忙碌的工作中，他给病人带来光明，培训了许多当地医生。”

奔巴的暖阳照耀着我们，在飘着丁香花清香的微风里，我们和奥玛医生挥手告别。

站在阿卜杜拉·姆才医院门口的大樟树下，我想到，公公和当年的援非医疗队员在艰苦条件下救治了许多病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本地医生。中国医疗队与桑给巴尔人民间的深情厚谊如同弥漫山野的丁香花，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孩子，见到我们都会叫上一句“亲呐，你好！”我身边的本地医生，有许多从中国进修归来，也有人申请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准备求学深造。我的小病号们喜欢学中文，希望长大后去中国学习。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这样不断延续、加深。更让我难忘的是，奥玛医生后来托人带来口信：他多年前见过中国医疗队带来的五星红旗，奔巴岛的丁香花晒干后颜色火红，他想把那些花送给中国医疗队员，因为“你们带来的红色是火焰，请把非洲的火样情感带回中国”。

（作者为中国（江苏）第三十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员）



1

2

图①：周振德教授援外期间为当地患者进行眼科检查。

周向东供图

图②：刘欣与当地病患合影。

刘 欣供图

『为俄中友好竭尽全力』

——追忆俄罗斯汉学家欧福钦

祝寿臣

听到欧福钦逝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著名记者、知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友好事业发展。我与欧福钦结识于俄罗斯“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奖评选活动中。

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十分成功，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俄罗斯新闻界对“中国年”活动和俄中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式报道，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2007年11月，中国记协和俄新社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奖评选，我作为中方评委会主任参加了这次评选活动。俄方5名评委中有一位个子高高、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中文名字叫欧福钦。

评委会经过两天的认真评选，评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类一、二、三等奖，欧福钦以其刊载在《俄罗斯报》上的《中国的腾飞与俄罗斯的未来》一文获得特别奖。

欧福钦生于1926年，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1953年至1959年任《真理报》驻中国记者，1992年至1996年以俄罗斯专家身份在新华社工作，曾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欧福钦后任俄联邦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政治评论员、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委员会理事。

欧福钦以面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而自豪。他说，他的中文名字“欧福钦”就是周恩来总理给他起的。他回忆说，他刚到北京工作时，只有12名外国大使和14名外国记者，中国政府每次举行国宴都会邀请他们。于是，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领导人。

当我问他在中国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1956年见到毛泽东主席。那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欧福钦作为《真理报》记者对大会进行报道。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主席专程来到记者休息室，进屋就问：“哪一个是《真理报》的记者？”欧福钦当即站起来说：“我就是。”毛泽东主席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

欧福钦说，同周恩来总理见面的机会更多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欧福钦记得有一次他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周恩来总理答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不是中国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抚今追昔，今天的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令他感慨万千。

欧福钦认为，中国的改革对其他国家具有启发意义。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把社会代价降到了最小。这样的改革过程通常非常艰难，但中国避免了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情况。欧福钦对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深表赞许。他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将作为和睦邻居、忠诚朋友和可靠伙伴长期相处。

在“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奖颁奖仪式上，欧福钦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记者，十分高兴能为增进俄中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点事情。两国新闻界要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愿为俄中友好竭尽全力。祝愿两国新闻界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牢固。”

欧福钦的讲话代表了中俄两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心愿，赢得了与会者的一片掌声。

漫步企鹅滩

黄玉林

距离南非开普敦几十公里的西蒙镇背倚桌山山脉，面朝印度洋，是前往好望角的必经之地。大约是因为桌山山体由花岗石构成，加上常年海风劲吹，表面基本没有植被，看到的都是裸露嶙峋的巨石。房屋从海边开始，沿山而建。

房屋之下，直至海边，绿树成荫。我们来时是冬季，仍然一路绿色相簇，许多鲜花尚在开放，普陀花、鸡蛋花、金色曼陀罗等，红的白的黄的，不断从路边探出。

离开车道沿小径而下，左侧全是开着小花的绿植，密密麻麻，花团锦簇中别墅隐约可见。另一侧是茂密的榕树林，几棵巨大的枯木似乎还有生机，形状各异兀自站立。经过小径，便来到了西蒙镇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博尔德斯海滩，这里是濒危物种非洲企鹅的重要繁衍地，故又被称为企鹅滩。

进入企鹅滩，一阵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颇感意外。企鹅聚居之处，又是冬天，花香从何而来？原来是栈道边的白色香雪球献上的香礼。不远处，几块不大不小的礁石隔出一片小海湾，白色海沙上有一簇一簇的低矮植物，众多游人聚集在那里，不停地拍照。我们走到近处，果然，看到了沙滩上许许多多黑白相间的非洲企鹅。

企鹅滩入口处，有一块牌子，萌萌的企鹅图像旁，用英文写着“欢迎来到博尔德斯”。我们走进一处小小的建筑空间，两边墙壁上精心布置着一些图片资料，展示南极企鹅、澳洲企鹅等不同种类企鹅的照片，体贴周到地为游客提供科普教育。我们这才了解到，世界上的企鹅有很多品种，其中，知名度、辨识度最高的是南极企鹅，尤其是南极帝企鹅最高可以达到1.2米，躯体肥胖，大腹便便，可谓企鹅家族中的“魁梧大汉”。非洲企鹅的个头大约是帝企鹅的一半，它们鹅脚黑色，黑背白肚皮，肚皮上有一圈黑色条纹，缩成一团时就显得更小了。而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则住在澳大利亚的菲利普岛自然公园里，身高只有30厘米左右。

小小的企鹅滩上，成百上千只非洲企鹅聚在一起，原以为会嘈杂一片。我们走近时，却感到出奇地安静。它们此刻沉默安详，并未被往来不绝的游客打扰，仿佛习惯了与游客和谐共处。我们站在沙滩上，只听见阵阵海涛拍岸的声音，感受着此刻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海滩偶有缓坡，企鹅们零零散散，慵懒地晒着太阳，似乎在打盹。它们大部分在自己挖成的浅浅的圆形沙坑里安然静卧，脑袋平伸，一动不动，面朝浩瀚的印度洋，好似神游万里。间或也有几只圆圆胖胖的企鹅慢慢站起，耷拉着两只手臂般的翅膀摇摇摆摆走几步，萌态尽显。

忽然，天空中一只海鸥低低掠过。一时间，沉思中的企鹅们齐齐伸长脖子，随海鸥飞过的线路同步转动脖子，目送它远去，动作整齐划一，如同一场严肃的行为艺术。飞逝的海鸥惊醒了企鹅，几只顽皮的小企鹅聚在一起，开始交头接耳，甚至咆哮呼号，追逐嬉戏。顿时，安静的企鹅滩开始活跃起来。

R翻译家说

在诗意中感知中国文化

拉嫡娜·迪米特洛娃

我的中国文学“翻译梦”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读汉学专业时就开始萌芽了。

2000年10月，进入大学第一个学期，我开始接触深奥难懂的中国古代文学。那时我中文水平还很差，但也能感受到它的美妙，尤其是在读唐诗的时候。每当读到唐代五言绝句，我都不禁感叹：仅仅20个字，是如何做到既能描写辽阔风景、绘就奇妙细节，又能表达深刻感情的呢？

读白居易的《池畔二首》，我从中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思想与高远追求。“竹少风来多”，简单质朴的5个字概括了作者渴求脱离羁绊、解放精神的理想。吟白居易的《长恨歌》，让我第一次接触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和长篇叙事诗。此后，我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回旋婉转的动人故事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主要课题之一，并对中国历史演变与文学创作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了新认识。我发现，诗歌在文学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悠久历史的一种精粹。

每次翻阅《长恨歌》，我都会发现新细节、获得新感受，两位主人公及其生活的时代跃然眼前。近20年来，我一直对这首诗的翻译细节反复推敲，有时以字面意思为重，有时以诗意为重，甚或以史诗风格、拼贴画风格来呈现，将其译成保加利亚语、西班牙语等不同版本。虽然如此，译本也还是不能令我满意。将更好的译本呈现给西班牙语和保加利亚语读者，让他们通过阅读经典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是我孜孜以求的“翻译梦”。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中国是这样，当代中国亦如此。要了解一个陌生国家的文明，现当代文化是最好的起点。2009年，我来到墨西哥后，开始思考将中国现当代诗人及其创作介绍给西班牙语读者，因此萌发了翻译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想法。我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报》的翻译坊积极合作，翻译发表了10多位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在与其他译者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不同语种诗歌的不同风格和翻译方式，积累了不少翻译经验，诗歌阅读、筛选与翻译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具备了更加敏锐的直觉和语感。

近年来，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诗人，翻译过30多位诗人的作品，他们诗歌中的灵感、对创作的追求令我惊喜与敬佩。我发现，中国诗歌不但文字优美、创作方式多样，寓意也极为深刻。与这些诗人的交流让我更全面地了解其人其作，进而了解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生活与文化。2021年，诗人王寅、蓝蓝的中西双语诗集在智利出版，这两本书是我近年来最重要、最满意的翻译成果。两位诗人有数十年的创作经验，翻译他们作品的最大挑战在于遴选：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中文诗集，思考哪些作品最能展现作者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又能吸引拉美读者。

翻译家要像外科医生一样，对心仪作品中的次要元素做出取舍，又要像画家一样，一笔一笔地描绘出诗歌的精彩面貌。翻译是将诗人一生的经历、情感与思想浓缩成一本独立的、有说服力且有审美价值的新作品并向读者呈现的过程。译者要与读者手牵手跨越作者几十年的人生与创作历程，这就是我的翻译理念。让诗歌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我的“翻译梦”也在一步步实现。

拉嫡娜·迪米特洛娃，197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现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语言、语言学与翻译学院翻译专业中西翻译教授。她曾在武汉、南京留学交流，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译有中西双语诗集《我的前生是一个补鞋匠》等，参与翻译出版西班牙语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等作品。

国际副刊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 迪

电子信箱：rmrbgjf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